

我造文字故我在

——論泰國文字的創制，兼談西夏文及越南文

嚴智宏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

摘要

「我思故我在」，同理，我造文字故我在。從「我造文字」這一點上，就能推論出我的存在。無論我所造的是什麼文字，都表示必然有一個造字的實踐者，那就是「我」；因此，「我存在」是無庸置疑的。同理，我的國家創制了專屬於我國的文字，這證明我的國家是存在的。藉由創制專屬於本國的文字，成員們可以想像彼此是一個共同體，並凝聚彼此的向心力；甚至能把這種想像以及本國的文化給書寫下來，傳諸久遠。本文以古今三個東亞國家（泰國、西夏、越南）為例，談論其造字之舉，以及東亞民族主義建構的現象。這三國雖然不同，但他們都圍繞在中華帝國周邊，也在印刷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他們都在試圖擺脫強大帝國之干涉或外族統治、獨立建國時，藉由創制或採用另一套文字來作為官方書寫系統，以建立國家認同，並強化自我的主體性。在這過程中，文字扮演了核心角色；它發揮了社會連結動因的功能，使原本互不認識的人們能連結起來，想像彼此是一個共同體。而且，它讓新國家之成員明瞭，自己的國家與前統治/干涉內政者有所差別。創制文字，讓那些受到強權或大國之統治、干涉或欺侮的較弱或較小的國家，有了一個自主的天地或場域，一個證明自己存在的利器，一個凝聚民心的重大工具，也讓較弱及較小的國家，能藉由文字為自己的文化而戮力，並為自己的天地或場域而辯護。

關鍵詞：文字之創制、泰國、西夏、越南、想像的共同體

壹、緒論

素可泰 (Sukhothai) 是泰國的一個朝代。素可泰原本是一個地方的名稱，位在今天稱為泰王國 (Kingdom of Thailand) 的中北部。西元 13 世紀上半葉，當地住民驅逐異族的統治者並且獨立建國，這在某種程度上類似 938 年越南打敗中國的軍隊、1776 年英屬北美十三州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情況。從 13 世紀上半葉素可泰獨立建國起，他們就以素可泰城作為首都，這個國家的名稱叫作素可泰，其疆域也稱為素可泰，其國祚約兩百年 (13 世紀上半葉至 1438 年)。因此，素可泰一詞同時是首都、國家、疆域、朝代的名稱；這種情形常見於東南亞，例如蒲甘 (Bagan) 一詞同時是緬甸在 13 世紀之前約三百年的首都、國家、疆域、朝代之名稱¹。

對現代的泰國人來說，素可泰王朝 (Sukhothai/Sukhodaya) 頗具意義。因為它開創了先河，這條先河淵遠流長，流傳至今。泰國人通常認為該國一向是自由的、從來沒有被殖民的國家，而其「自由」的起點就是素可泰時期。按照字面意義來說，「素可泰」是指幸福、美好的曙光。我們回顧過往，可以發現歷史上的素可泰時期，正如它的字面意思所示，是一個好的開始。

具體而言，這個好的開始至少有以下層面。在政治上，當時素可泰脫離了吳哥帝國 (Angkorian Empire, c. 802-1431)，揮別寄人籬下的境況，開創新局。在經濟上，由於終結了外族的統治，因此能夠當家作主，自行管理、分配及使用資源，不必向高一層級的政府捐輸資財、稱臣進貢。在宗教上，素可泰藉由轉換宗教方向及其藝術，來凝聚人心。這時，長老上座部佛教 (Theravada Buddhism)² 在王室的支持下成為主流宗教並延續至今，而印度教、大乘佛教 (這兩者是吳哥帝國的官方宗教) 雖然依舊存在並具影響力，但已經不是主流。在藝術上，從這時期開始，該國藝術經常呈現有

¹ 當然，古今的疆域有所不同。另，Heine-Geldern (1956: 3) 指出，在古代的東南亞，首都經常代表一整個國家。

² 俗稱「小乘佛教」，以下簡稱「南傳」。

別於他國的特殊風貌，並且為泰國後世立下可長可久的典範，數百年來一直是該國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一，至今依然（Griswold, 1967; Gosling, 1991; Stratton & Scott, 1987; Diskul, 1999; van Beek & Tettoni, 1999）。在文字上，素可泰創制了泰文，使該國跨進擁有專屬自我文字的時代（詳如後）。

泰國在 1283 年創制了泰文字母；此事的核心意義不在於有文字，而在於擁有自己創制、專屬自己的文字。因為在這之前，泰國使用的是外族文字，並無自己的文字；然而從 1283 年開始，泰國提升到另一個層級，這標誌著一個新建立的國家在文化上追求獨立自主的堅強意志。當時，素可泰在許多方面都顯露出一種掙脫枷鎖、尋找自我、建立主體的意圖；除了上述的政治、經濟、宗教及藝術之外，創制文字也是這個浩大工程的一部分。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各種 Thai 情況，其本質就是形成於素可泰時期（鄭煥昇，2018a：116）；至少在文字上，從這個時候開始，泰國創制了屬於自己的文字，不再沿用外族、前統治者的文字。必須說明的是，創制文字是一個非常吃力的重大工程，但也是一件區辨人我、建立國家認同、展現主體的創造性工程；一個剛建立的國家願意不惜耗費時間、精力去創制一種新的、專屬於自己的文字，這表露出該國「筮路藍縷、走自己的路」之決心。本文討論泰國何以要創制泰文，兼論亞洲其他兩個國家的文字系統。

貳、文獻探討與分析架構

關於造字，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之語³。它的大意是：(1)重要性上，對於人類文明而言，文字的創造實為關鍵，足以驚天地、泣鬼神。(2)功效上，文字使人類的經驗及智慧能夠被記錄、傳佈、傳承和教育；人類能學到前人的寶貴經驗，不必再浪費時間於重複前人失敗的路徑，人類因而節省了很多精力，生產力也大幅提升。(3)時間上，在洪荒時代，人類沒有文字；鬼神也許可以主宰人類。當時可能由於處於蒙昧時期，人類畏懼各種自然造化的現象，如閃電、打雷、暴雨、山洪暴發、大旱、

³ 劉安 [西漢]，《淮南子》卷八，〈本經訓〉。

森林大火、地震等等，無法理解其義，因此認為上述現象是鬼神作祟。其次，可能由於人類想像鬼神能力超凡，於是有些人假借鬼神之名，操控或愚弄他人。然而自從創造文字之後，人類可以累積一代代的經驗，以集體的智慧去解讀造化的秘密，於是文明大為進步，較少人能夠假借鬼神之名去愚弄他人。易言之，藉由長期的探究並且以文字予以記錄、傳承，於是人類不僅越來越能理解自然現象，不再把那些現象歸因於鬼神，也沒有那麼懼怕鬼神了。這正如唐朝的張彥遠在其《歷代名畫記》裡所說的，文字出現後「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4)感通力上，文字是一種符號，可以感召鬼神。目前在許多民間宮廟裡仍可見到用於召請、驅趕鬼神的符籙；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許多信徒認為符籙有感通鬼神之力。要言之，人類創造文字，使鬼神有感於人類試圖掙脫蒙昧、奮力掌握自我的意志，於是夜裡啼哭。

人類對於鬼神到底瞭解到什麼程度、什麼層面？這個暫且不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對人類而言，創制文字確實非常重要。一，無論是否真有倉頡此人，無論其是否真的造字，也無論造字時是否「天雨粟、鬼夜哭」，自從創造文字之後，人類的經驗就可以被記錄下來，並且往後代傳遞，人類的文明因而大為躍進。無論對哪個民族來講，創造文字都是一件大事。二，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說，「我思故我在。」換言之，從「我在思考」這一點上，就能夠推論出我的存在。這也指著：我在思考，不管我所思考的是正確或錯誤的，都表示必然有一個思考的實踐者，亦即「我」；因此，「我存在」是無庸質疑的，這也是真理最終還原之處。

文字可以成爲一種媒介，把原本不相干的人群／族群給聚攏在一個旗幟下。換句話說，文字具有社會性、關係性。一群共享一種文字的人，可能藉由共享該文字（而且只使用該種特定文字），因而想像彼此是一個共同體。那種想像，不但爲成員的經驗提供了意義，也是一種有力的社會連結動因（social bonding agent）。藉由它，可以把「我」的思維給傳播出去，讓具有「我」這種思維的群體漸漸擴大，也使得原本完全不認識的人群能夠連結起來，產生認同，增進彼此的情誼和關係，進而凝聚爲一個社會，並且成了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一個特定社會，常常被其中某些人所提出的

想像／願景給引導，因而聚合在一起（Fabiani, 2009: 226-43, 309-12）。

安德森把民族定義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Anderson, 1991: 6-7），他說：民族之所以是想像的，是由於類似「成員之間相互連結」這樣的想像，活在眾多成員的心中；即使是在一個很小的民族裡，其成員從來不認識大多數的其他同胞，也不會和他們碰面，甚至不曾聽說過他們，然而「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他們的心中。他說這「想像的共同體」之成員，可能終其一生也不會去認識其他的每一個成員，但是他們卻認為，他們都是同一個民族的一分子。在這些成員的心中，有一個親密或彼此親近的意象；例如，當其「想像的共同體」之成員參與了大型（如奧林匹克比賽之類）的事件或活動時，則其民族的成員，會一起分享作為一個相同民族的感覺。而且，民族經常會被想像為一個群體；在這個群體中，其成員之間被想像成具有關係深刻、地位平等的同胞之情誼，雖然實際上在每個民族內可能都存在著普遍的不平等、剝削。正源於這種想像的同胞之情，因此在過去兩百年的時間裡，數以百萬計的人甘願為了本身所屬的民族，去屠殺別的民族或從容就義。

安德森認為，「想像的共同體」之所以成為可能，是由於印刷資本主義。由於資本主義企業家以營利、累積資本為目的，為了極大化其利益，因此他們盡其所能地增加其銷售量。於是，他們以本地語文出版或發行他們的書刊，這些刊物取代了往昔只有少數人能懂的外來書面語，例如拉丁文；因此，以本地語文出版的書刊，使得沒有學習過拉丁文的、大量的當地百姓得以閱讀書刊，並學習到更多知識。其結果是，使用本地語文的讀者，能夠藉由閱讀本地語文之書刊而與本地的其他人相互交流，並且因而出現共同的論述。歐洲第一波出現的民族國家，就與民族印刷語言有關。

安德森的理論讓我們得知，印刷資本主義是民族主義擴張的重要因素；然而該理論所談的主要是近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而非前現代的。換句話說，其理論有助於瞭解西洋民族國家的形塑，使讀者明瞭民族是社會所建構的共同體，是由一群認為他們乃該群體的一分子的人藉由想像所建構的，而且「想像的共同體」源自印刷資本主義。可是，其所舉例證主要是近現代的西洋國家（雖然有兼及東方），而非前現代的東方國家。筆者知

道其中的差異，也無意全盤挪用該理論來撰述本文；本文以該理論作為出發點，聯想至東方以及不同時期的國家，並檢視中華帝國周邊的幾個特定對象，如素可泰、西夏、越南，以思考東亞民族主義建構的現象。

本文想討論的是，在印刷資本主義出現以前，東方國家（如素可泰、西夏）不會想像其本身是一個共同體？在西元第一個千紀已然存在的國家，像是柬埔寨的高棉族、日本的大和族、中國的漢族等等，都早於印刷資本主義，可是他們與「想像的共同體」完全無關？本文討論的重點之一是，在近現代的印刷資本主義之前，是否有其他因素，如語言文字，足以凝聚人群，使其成為一個共同體？譬如，素可泰之住民是否可曾想像其為一個共同體，一個獨立自主、有主體性、有專屬文字的新國家？以這種視角來觀察，素可泰建國之初的主政者應該有可能想藉由泰國文字的創制，把新建立的國家之住民納在同一個文字體系之下，使其認為他們是素可泰國家的成員、這個新成立共同體的一分子⁴。

參、泰國文字之創制

如上所言，「素可泰」是指幸福、美好的曙光。其他的面向不論，如果站在創制本身的文字之角度來看，則素可泰時期可謂一個好的開始。當時，素可泰不僅擺脫了外族高棉（Khmer）的統治（Hall, 1994），獲得獨立，而且創制了文字。素可泰文字的出現，標誌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新文化的開端。然而，那時素可泰所面對的是一個不可預測的未來，因為獨立之後何去何從、結果將會如何？無人能知。儘管如此，素可泰依然致力於必要的建國工程，例如，一定要致力於文化建設。

建國之初，素可泰決定要創制屬於自己的文字。此一重大工程的靈魂人物，應該是該王朝的第三任國王蘭甘亨（Ramkhamhaeng，13 世紀後半葉在位）。在蘭甘亨登基之前，其父王因陀羅地（Sri Inratit）與族人一同奮力

⁴ Anderson (1991) 指出，出版、宗教改革、在地母語的地位提昇，是近代西歐民族國家（nation-state）意識形成的重要源頭。

驅逐吳哥帝國之軍隊，成爲素可泰的第一任國王，接著他傳位其子。第二任國王是蘭甘亨之兄，其在位期間較短，之後傳位弟弟，這位弟弟就是蘭甘亨。蘭甘亨在該國創建之初，曾經挺身而出、對抗敵人，在穩定政局上扮演了關鍵性角色。他在軍事武功上卓有成就，在文治上更佳，尤其是在文字上。當時這個新生的國家有自己的語言，但是沒有自己專屬的文字。蘭甘亨審度時勢，認爲泰國在政治上已經獨立了，但是還沒有完整的主體性；泰國應該要有自己的文字，否則雖然已經建國了，然而在文化上仍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全獨立的國家。在 12 世紀、13 世紀初統治素可泰地區的頂頭上司（吳哥帝國）有自己的文字，那麼從吳哥帝國統治下獨立出來的素可泰，爲何仍用高棉文？蘭甘亨的重大決策之一，就是創制泰文；在這之前，素可泰使用高棉文，並無自己創制的文字。

當時，蘭甘亨以周邊既有的文字爲基礎，來創制泰文（朴景恩，2018：135）。換句話說，素可泰建國之後，蘭甘亨斟酌借用周邊地區或國家的幾種文字，予以綜合、修改，來把在地泰人本身的語言以適當有效的字母給拼寫出來。這些被借用或參考的文字，包括了高棉文、孟文等。

當時蘭甘亨身爲一國之君，面臨了棘手的情境以及選項。首先，這個新生的國家，要沿用高棉文？那是異族、外國、前統治者的官方文字。實際上，沿用舊制、舊的官方文字是容易的，只需要維持現狀、繼續行之有年的習慣即可，不需煞費心思去改革，也不必創制新的文字。然而，如果選擇這一條路的話將有副作用；亦即，既然新國家已經成立，若全盤照用異族、外國、前統治者的官方文字，則可能損及新國家在文化上的主體性。畢竟，語文可用以區辨人我、建立認同⁵。素可泰在 13 世紀上半葉驅逐吳哥統治者的軍隊、宣布獨立，然而這僅是形式上的行爲及宣布而已，它距離實質上的獨立自主還有一大段路。若要具有實質內涵的獨立自主，則必須培養自己的文化、建立自我的國家認同、穩穩地立足在其所管轄的土地上。因此，素可泰除了宣布獨立之外，必須在文化上形塑自己的特色、建立主

⁵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以民族母語從事創作之風氣，促使國民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s）發展；這是形成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關鍵之一。

體性，如此才算是真的獨立自主了。在這種情境下，其國王當然必須有所作為、也有所不為（否則延續之前百年、寄人籬下的情況即可，何需冒險追求獨立？）。

其次，在素可泰境內要停用高棉文？這個選項（停用）是容易的，只需國王一聲令下即可；然而，癥結在於停用之後，將以什麼文字來取代高棉文？當時，素可泰本身並無文字。這時，必須回到一個關鍵問題上：素可泰是否要創制泰文？創制泰文，將有助於建立文化自主、形塑自我的認同；然而，創造文字非常不易，必須從無到有、由「零」（空無一物）到「一」（已有物件，即使它在構造上簡單、在數量上不多），那是可能會「天雨粟、鬼夜哭」之事。而且，若要將其頒行落實、傳諸久遠，那更是浩大工程。當時素可泰境內，應該有人能讀高棉文、緬甸文，但是創制泰文之後有誰能讀這種新文字？以後如何普及？然而，蘭甘亨仍決定走上創制之路。雖然創業維艱、工程浩大、令人望而卻步，但是該做的就要做，畢竟那關係到新國家的認同、新文化的建立。既然應該做，那該如何做？蘭甘亨糾集境內知識分子，一起來面對這個重大問題。

當時蘭甘亨在數個周邊國家的文字裡，尋找適合的參考對象。這裡先以高棉、緬甸為例。第一，前統治者吳哥帝國所使用的高棉文，是主要的參考對象。原因如後：(1)在熟悉度上：高棉文以「官方文字」的位階，在素可泰地區至少已經通行了一百年以上，可說是知識分子所熟悉的一種文字，並非在地人士感到完全陌生的文字。(2)在語順或句法結構上：其與泰語相同，重音也放在語句後面。(3)在文字的構造上：其與後來才出現的泰國文字相同，都是在子音的上下左右添加母音，其所使用的音符標記方式也大致類似，雖然不盡相同。因此，對蘭甘亨而言，高棉文適合用於參考。

第二，泰國的西邊鄰居是緬甸，因此緬甸文也可以參考，但不很適合。因為，(1)在語順或句法結構上：其與泰語不同。緬甸語的順序通常是主詞、受詞、動詞，而泰語的順序則通常是主詞、動詞、受詞（鄭煥，2018b：132）。因此，如果借用緬甸語文來創制泰國文字，則日後將會經常碰到一些問題，例如，在書寫時會有順序上前後顛倒的情況，而且口語及文字書寫可能成為兩個彼此不同、相互干擾的系統，這樣將產生不便，而且是恆久性的不

便，恐怕窒礙難行。(2)如果以親屬關係來譬喻的話，則高棉文、泰文之間像是兄弟姊妹，而緬甸文、泰文之間則像是遠房親戚（鄭煥昇，2018b:132）。因此，緬甸文並不是很好的參考對象。

第三，以距離素可泰不遠、位在南方的馬來半島為例。這裡所說的馬來半島，在各個層面上都與今天的馬來西亞國有所差別；但是泰國的南部（無論各朝各代的國界在何處）常與馬來半島相鄰，文化上頻繁往來，因此本文提及馬來半島。(1)在大約 7 到 13 世紀時，馬來半島一帶在印度梵文的影響下，產生了本身的書寫系統，並且借用了不少梵文的語法、字彙；刻寫於 683 至 686 年間的四塊石碑銘文，是印度梵文影響馬來語的重要證據，同時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馬來文字。(2)阿拉伯文化在 13 世紀前後，隨著伊斯蘭的傳布而陸續進入馬來半島，並且逐漸取代了梵文，成為馬來文發展的關鍵因素；此時，馬來文改以阿拉伯字母來拼寫，這就是後來所稱的「爪夷文」（Jawi），它也成了馬來古典文學、宮廷文學的主要書寫系統。同時，馬來文借用了許多阿拉伯文的詞彙，在語音方面也增益了馬來語輔音重疊之頻率。(3)隨著近現代局勢的變化，西洋國家紛紛擴張至東南亞，16 世紀初，馬來文漸漸改為以羅馬拼音的方式來書寫（廖文輝，2019）。在 13 世紀末當政的蘭甘亨，應該是對通行於素可泰的高棉文較為熟悉，而對剛剛傳到馬來半島的阿拉伯文較為陌生。

第四，以位在素可泰東方、距離其稍遠的越南為例。(1)越南自中國的秦朝（221-206 BC）以降，就使用中國的漢字作為官方的文字書寫系統（Nguyen, 1999: 2）。越南在 13 世紀時，仍以漢字來撰寫官方文書。(2)在字體構造上，漢字以橫、豎、點狀、左右撇的筆畫來組成文字，每個字都自成一體，每個字通常都在十幾畫以上，不容易學。以「難學」為例，「難」字有 19 畫，「學」有 16 畫，一個初學者若要把這兩個字記起來，必須使用很多的時間及心思。但是以拼音的方式來學習文字，則通常比較容易。(3)漢字的字與字之間，如果沒有標點符號，或標在不同的位置，抑或標錯了位置，則很容易誤讀、錯解或作多種解讀。例如，「清心也可以」只有五個字，卻能以多種不同的方式來加上逗號，其意思也跟著逗號之不同而產生變化，在語意上並不清晰，在往來溝通上可能會引發問題。因此，對於蘭甘

亨而言，中文並不是一個好的參考對象。

整體而言，在創制泰文時，高棉文是一個不錯的參考對象。因為，泰語、高棉語兩者無論在語順或句法結構上，都大致類似，而且素可泰住民已然熟見高棉字母，知識精英也能夠參酌高棉文來創制、標寫自己的語言（之後創制出來的泰文，在母音子音的位置及符號上，也大抵類似）。相對而言，周邊其他國家或地區（例如緬甸、馬來半島、越南）所採用的官方書寫系統，如果不是在文法、語句結構、母音子音的標示上有所不合，就是無法妥善地據以標寫泰文，或者在文字結構上很複雜、學起來有所不便。

雖然如此，但是蘭甘亨只能參考高棉文，而不能將其全盤接收、移植到素可泰。原因已如上述（亦即創制文字，與形構國家認同、建立文化主體性有關；如果沿用或全盤移植異族、外國、前統治者的文字，以作為新國家的官方書寫系統，則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損新國家的文化自主），這裡不再詳述。於是，蘭甘亨召集其領土上的精英，包括那些熟悉高棉文、孟文（Mon）的人士，一起合力創制了泰文字母（Griswold & Prasert, 1971: 207）。

這裡必須說明孟文（Mon）。孟文是孟人的文字。在素可泰王朝成立之前，在今天稱為「泰王國」的這片土地上，住著一個主要的族群，就是孟人，而非泰人。孟人崇奉南傳，並且製作了許多釋迦牟尼雕像、塔寺，其所留下的文化，被今天的泰國人以墮羅鉢底（Dvaravati, 6-11 世紀）來稱呼。10 至 11 世紀時，孟人的國度在高棉吳哥帝國的擴張政策下，逐漸被蠶食、乃至解體，因而住民分散，跨界遷移到大陸東南亞（Continental Southeast Asia）各地，尤其是泰北、緬甸（嚴智宏，2005）；孟人所遺留的大片空間，在 13 世紀上半葉時已經住著很多今天被稱為「泰國人」的百姓。當時這些人業已成為素可泰地區之主要人口；這些人被吳哥帝國統治過一段時間，但把握機會，趁吳哥帝國內部「有事」時，驅逐當時帝國派駐在素可泰地區的統治者，獨立建國。在那片土地上仍有孟人的後代子孫，他們之中有人依然懂得孟文；職是之故，孟文也成為蘭甘亨在創制泰文時的參考對象之一。那時，蘭甘亨以堅強的意志，朝著篤定的方向，在穩定的時局裡，一步步創制並推行泰國文字。

我們從這裡可以明顯看出蘭甘亨追求獨立自主的意志、決心。文字雖

然是建立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的唯一因素，但它是很重要的基礎之一（Liebkind, 1999: 144）；文字對族群、國家認同是否有催化作用？這必須與其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一起考量（Fishman, 1999: 154）。一個國家或族群可能在建立自我認同、意圖區辨人己、顯示其與他族或他國（尤其是前統治者）之差異的情境下，費心創造新文字。當時，素可泰地區的主要住民是泰人而非原統治者（高棉人）；素可泰驅逐了高棉吳哥之軍隊、成立新國家時，當然要建立自我的文化認同——否則在政治上繼續臣服於吳哥帝國，並全盤接受其文化即可，不必冒險獨立建國——於是創制自己的文字，讓新國家的成員有在一起認同的對象，以表示其與之前的時代／國度有異。然而，文字創造不易。若非抱定披荊斬棘、開闢新局的堅定決心，否則素可泰繼續使用高棉文、承襲行之多年的慣習就可以，不必煞費周章、另起爐灶、創制屬於自己的文字。由此可知，蘭甘亨誓願擺脫往昔的影子，走上構築自我文化主體的道路。

最後要解釋，「蘭甘亨創制泰文」之說；其主要的歷史證據來自〈蘭甘亨第一號石碑〉（Ramkhamhaeng Inscription No. 1）。由於素可泰早期所留的資料很少，因此這塊石碑在 1833 年被「發現」後，格外引人注目；這塊石碑上的文字紀錄，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泰文作品。它是當年的古文物，也是重建中古時期泰國概況的關鍵證據。可是該石碑四面所刻的文字之文體、視角、主詞或人稱的變化等因素，引起學界的辯論；換言之，石碑的真偽引起論戰。國內外的參戰者大致可分兩派，一派認為石碑是拉瑪四世（1851-68 在位）「偽造」的，其目的在於援引古代之例，以支持泰國當時所採的政策，並激勵泰國的民心士氣、以免於受到西洋列強——尤其是英法兩國——之殖民；由於是「偽造」的，因此露出不少破綻。另一派則認為，即使碑銘本身可能有文體、視角、主詞人稱上的小問題，然而那些疑點都不能與「石碑乃偽造的」劃上等號，畢竟草創的文字未臻成熟，各國文字在草創時期都不成熟，沒有辦法在剛出爐時就完美無缺。學界至今仍在討論其真偽，然而傾世界各國學者之力，依舊不能把這塊石碑給推翻，其文字所言之情況大致也與鄰國之記載相符（嚴智宏，2020）。

肆、西夏、越南的例子

一、西夏

李元昊，黨項族人，是西夏開國之皇帝（1038-48 在位）。西夏原本向北宋稱臣，但是胸懷大志的李元昊在登基後，即進行一連串的改革，而且這些改革都具強烈的象徵性意義。

1. 爲了表示獨立自主，因此他廢掉之前唐朝、宋朝對西夏所賜予之國姓——李、趙——改姓嵬名，表示不再臣服於中原強權。
2. 他建立「大夏」之國號，又稱「西夏」，立年號「天授禮法延祚」；「天授」兩字之義，是指其帝位爲上天所授予的，正如中原強權的皇帝自認是「天之子」或「天子」一樣；接著他定都興慶府（今寧夏省銀川市），不認北宋的開封爲京師。
3. 他以元魏（鮮卑拓跋氏所建立之國家，386-535 年）王室的後裔自居，因爲數百年前，鮮卑拓跋氏就在中國北方建立國家，不受「正統王朝」約束；他又自稱「兀卒」，那是黨項族語的「天子」之意（《宋史》〈仁宗本紀二〉，《宋史》〈夏國傳〉）。
4. 驍勇的李元昊登基後，連續向北宋發動戰爭，在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麟府豐之戰、定川寨之戰等四大戰役裡，其勁旅殲滅了北宋佈署在中原西北的數萬部隊；他也敢於向北宋的敵人——遼——挑戰，在遼國、西夏第一次賀蘭山之戰時，大敗遼國，奠定了西夏、遼國、北宋三國鼎立的局面。

在武功之外，李元昊也以強猛的意志和手段，建立文化上的主體性。他在位時確立西夏文字，同時大力發展西夏文化，創立學校，推動教育，大開西夏的文教之風。關於西夏文之創造者，歷來有不同說法，一是元昊命令大臣野利仁榮（?-1042 年）創造（沈括《夢溪筆談》）；二是元昊自製（《遼史》；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三是元昊自製了部分，令大臣在其基礎上演繹擴充（《宋史》）。無論何者爲是，莫不指向一點：元昊主導此一重大工程，使西夏文字系統化、規範化、作爲國家的書寫系統。在形式上，

西夏文字仿照漢字，是一種典型的方塊字（李范文，1983；史金波，2004）。

西夏文字確立後，李元昊下令尊為國字，諭示日後全部的公文一律使用西夏文字。於是上自詔令，下至民間書信，普遍使用西夏文。野利仁榮派遣弟子到民間傳授，幫助百姓學習、使用西夏文字；野利仁榮也以身作則，前往民間重要場所擔任教席；為了方便國人學習，他還費心編輯、印行西夏文的字典。必須說明的是，在西夏建國之前，黨項族日常都使用漢字，沒有屬於自己的文字。李元昊登基後，攻取瓜州、沙州（敦煌）、肅州（酒泉、嘉峪關一帶），據有河西走廊，並且幾度大敗北宋、遼國的軍隊，可說是西北的強大國家。在武力上，他與宋、遼兩個大國已經形成三強鼎足而立之勢；然而在與各國的文書往來上，西夏使用宋朝的文字、沒有自己的文字，這在國格或氣勢上顯得低人一等，無法平起平坐。因此，李元昊想創制一種專屬於西夏的文字。

建國大業、軍事武功佔用了李元昊的主要精神和時間，他應該沒有餘力去創造文字。因此，比較合理的情況應當是，他命令野利仁榮（西夏第一文人）來擔負此一重責大任。這位文人嫻熟漢地文化、典籍，也是西夏建國之初各種典章制度的主要謀畫者；他在參考漢字構造的基礎上，創制並整理了專屬於西夏的文字。乍看之時，這種文字在外型上類似漢字，但實際上兩者有別。在筆畫上，西夏文字較漢字複雜許多，並且避免與既有的漢字相似；在今人可以辨認的六百多個西夏文字裡，沒有任何一個與漢字相同（頤和大有，2021）。這明顯表示，西夏要擁有自己的文字，不願意在專屬的文字上與中國相同；當然，這背後應該有李元昊的意志在。

綜上所述可知，西夏開國君王李元昊銳意創制文字，以示與中國有所區別。他要開創自己的路，不要臣屬於中國。

二、越南⁶

越南早期並沒有為自己的語言創造出普遍通行的書寫系統。

⁶ 越南早期（至少 2200 年以前，也就是中國統治越南之前）已有銅鼓文，那是原初的越南文字，但中國也宣稱是銅鼓文的創造者；越南、中國雙方正在爭論誰是這個文字系統的所有者。

1. 秦朝時，漢字已經傳入越南；西漢時，越南正式被納入中國版圖，漢字湧入。在這段中國直接統治之時期，越南一直使用漢字作為官方的書寫系統。
2. 越南於938年打敗中國入侵的軍隊，但是越南朝廷仍推廣「儒學」，使漢字繼續通行；陳朝（1225-1400）以後，漢字仍是越南官方及民間的主要文字。
3. 有人嘗試以漢字為底，創造新的文字，供婦孺使用，它被稱為喃字（Chữ Nôm）。但是這種越南自製的文字，始終無法取代漢字，因為它在構造上算是複雜。
4. 歐洲傳教士陸續在 16 世紀末、17 世紀初抵達越南傳教；他們為了學習越語、以便於和當地人溝通，於是以歐洲人熟悉的羅馬字替越語設計一套拼音的書寫系統。目前，越南使用的國語字（Chữ Quốc Ngữ），是由 17 世紀到越南的法國傳教士亞歷山大·羅德（Alexandre de Rhodes）在先前傳教士所創的拼寫基礎上綜合整理而成的。但是其推行之成效有限；因為，在越南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的心態下，如果使用西洋的羅馬字，很容易被當成趨附殖民政權的人。
5. 當民族主義者瞭解到羅馬拼音字較為簡單、比較容易學習、是教育大眾的工具時，羅馬字本土化遂成了有利工具，可用於對抗外來殖民者及統治者。
6. 胡志明於 1945 年宣布越南獨立後，決定要使羅馬拼音字成為國家唯一的正式書寫文字，並且全面推行羅馬字教育（蔣為文，2017）。

胡志明在此重大事務上，扮演關鍵角色。二次大戰結束前後（1945 年），他反對中國軍隊進駐越南（Jiang, 1971: 107）。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政治上，他擔心如果中國軍隊進駐越南，會讓中國有機會再度控制或在很大的程度上插手越南的內政，就像 19 世紀末之前那樣。其次，在文化上，當時他正在推動越南拼音文字普及化的工程；如果中國軍隊再度進入越南，則他的計畫可能生變。

胡志明於 1945 年宣布越南獨立後，公開宣揚要以羅馬拼音為越南官方

唯一的書寫形式 (Ho, 1945: 64-65)。原因至少有幾：

1. 在字體的構造上，羅馬拼音文字遠比漢字簡單；由於簡單，因此容易學習。以「很難學」為例，若以羅馬拼音的方式（如英文）來拼寫，則只需以西洋拼音文字之中的幾個字母，即可拼成 *very hard to learn*，但是以方塊字來拼寫，就需要較多筆畫及較多時間了。明白了這種情況，就可以知道為何從 1945 到 1953 年，短短幾年之內，越南的識字率從 20% 躍升到 70% (Chiung, 2020: 28)。
2. 在胡志明心中，羅馬拼音文字可說是「越南—中國」之間的一條文化界線，這條界線既特殊又明顯 (Chiung, 2020: 29)。換言之，羅馬拼音是西洋普遍採用的文字拼寫系統（如英文、法文），而方塊字是東方國家常見的文字系統（如中國漢字），以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字系統。越南在 1885 年之前經常受中國影響，包括自秦朝以降就接觸漢字，從漢朝開始就長期使用漢字作為越南官方的文字體系 (Nguyen, 1999: 2)。胡志明矢志爭取越南的獨立自主，因此他不僅於 1945 年宣布越南在政治上獨立，也要讓越南在文字上有自己的系統；更重要的是，他要藉由這個新的書寫系統來建立國家認同，使越南擺脫往昔兩千年的中國影響。據此可知，官方文字與國家認同之間，以及官方文字與文化主體性之間，有緊密的關連性。
3. 胡志明說，法國政府在殖民越南時，蓄意不讓越南人民接受教育。法殖民政府希望越南人都是文盲、都不識字、都沒有受教育及啟蒙，這樣才便於法國的殖民。既然越南已經脫離法國的統治了，那就要作頂天立地、堂堂正正的越南人，不要再向西洋殖民者鞠躬哈腰，不再受西洋強權輕侮，當然也不再受中國的支配。同時，越南人必須受教育。如果越南整個國家真的要獨立自主，就必須使百姓普遍接受教育、讀書識字。而羅馬拼音化的越南字，容易學習容易記，大家經由這種文字來接受教育、提升知識及智能、增進全民的文化水平，這樣才可能使越南成為世上一個新的、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 (Ho, 1945: 64-65; Chiung, 2020: 53-54)。

伍、結語

本文以古今三個亞洲國家為例，談論其造字之舉。首先，西夏在 11 世紀脫離中國約束、獨立建國時，藉由創造自己國家的文字，來區辨其與中國的不同，並建立自我的國家認同、文化主體性。在這過程中，文字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文字是一個指標，它讓西夏人知道，本身的文字與中國的文字有異。其次，越南在 20 世紀中、脫離殖民統治之際，藉由全面採用羅馬拼音文字為官方書寫的唯一形式，來分別其與中國的不同，甚至切斷其與中國的文化臍帶。此舉除了有助於建立越南的國家認同之外，也大有助於提升越南人的知識水平、教育程度。在這過程中，文字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它讓開始接受普及教育的越南人知道，自己與中國確實不同；不僅在國籍、國名、地理上有異，在文字上也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系統。

本文所談論的主要對象——泰國——在 13 世紀上半葉獨立建國時，藉由創制泰文字母，來分辨其與前統治者的不同。當時，蘭甘亨除了在政治、軍事、經濟、宗教等層面為這個新國家奠定基石之外，更為其文化擘畫了方向，亦即藉由創制泰文，來開創這個新生國家的文化。在這過程中，文字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它讓泰國人知道，自己與吳哥帝國真的不同。當時，泰國（素可泰）如果沿用既有的高棉文，其實在許多層面上是較為省時省力又方便的；但是，素可泰依然不辭勞苦、創制了自己的文字。雖然它參考自其他文字、並非全然新穎，但終究有異於前統治者的字母。藉此，這個新成立的國家走上文化自主的道路，建立自我的認同，而且延續至今。

以上幾個例證雖然有國家、年代上的不同，但相同的地方是，他們全都是在脫離強鄰干涉或外族統治、獨立建國時，藉由創制或採用另一套文字來作為官方書寫系統，以區辨人我、建立國家認同、強化自我的主體性。在這過程中，文字實為其核心；它讓新國家之成員明瞭，自己的國家與前殖民／統治／干涉內政者有所差別。創制文字，讓那些受到強權或大國之統治、干涉或欺侮的較弱或較小的國家，有了一個自主的天地或場域，一個證明自己存在的利器，一個凝聚民心的重大工具，也讓較弱以及較小的國家，能夠藉由文字為自己的文化而戮力，也為自己的天地或場域而辯護。

如前所述，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換言之，從「我在思考」就能推論出我的存在。無論我所思考的是正是誤，都表示必然有一個思考的實踐者，就是「我」；故而「我存在」乃是正確的，也是真理的還原之處。

同理，我造文字故我在。從「我造文字」這一點上，就能夠推論出我的存在。這也指著：我造文字，不管我所新造的是什麼系統的文字，都表示必然有一個造字的實踐者，就是「我」；因此，「我存在」是無庸置疑的。不但「我存在」是正確的，而且我從此有了專屬於自己國家的文字，證明自己的國家是存在的。同時，藉由本身國家的文字，以凝聚國家成員的向心力，並且把自己的文化給書寫下來，傳承下去，期待能夠傳諸久遠。

可延伸討論的議題之一是：與中國相鄰的國家或地區，無一不曾與中國發生爭執，絕大多數還發生過戰爭，而且他們大都創制了自我的文字。除了本文所談的泰國、越南、西夏之外，其他（依照順時針方向來說）如蒙古、韓國、日本、寮國、緬甸、西藏等，幾乎都創制了自我的文字，而且多與國家認同有關；台灣雖然使用漢字，但基本上是繁體字、台式中文，還出現了羅馬化的台語文，而非當代中國的簡體、方塊式中文。在歷史過程中，有些國家的知識階層採用過漢字，如韓國、越南，但後來都不約而同地推行屬於自己的文字。日本雖然使用許多漢字，然而其字義與中國的漢字之間已出現很多歧異；例如，中文所說的「大丈夫」是指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而日本所說的「大丈夫」則是指沒問題。

上述各國創制自我的文字，應該是一個具有整體性的現象，並非只是小「我」創造文字而已。換言之，這並不是「單純的、在某一個國家、由某一個人突發奇想、於是創造了文字」的問題；它應該是某個國家在面對強大帝國時，基於整個群體應該具有的國家認同或文化主體性——無論那是自己想追求的或是在強大帝國的刺激下所出現的——而迸發的整體性現象。因為，如前所述，一群共享一種文字的人，可能藉由使用該種特定文字，因而產生有力的社會連結動因，也想像彼此是一個共同體；而且他們可能在面對強敵時，把小「我」的思維往外傳播，使得具有小「我」的思維之群體在數量上逐漸擴增，並使得成員之間的情誼和關係持續地增進 / 加深，還凝聚為一個大社會，以應對強敵所施加的壓力。更進一步來說，

在過去大約一千年的歷史長流裡，上述中華帝國周邊的國家，幾乎是群起創制了自我的文字，以示其與帝國有所區別。這已經成爲一個整體的、普遍的現象了，而非哪個單一鄰國的特殊現象。

爲何中華帝國周邊的國家，要創制屬於本身的文字而不願意臣服在中國的漢字系統之下，也不想繼續成爲大漢字圈的一員？這是往後值得探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

- 中華神祕文化，2019。〈倉頡造字，為什麼會「天雨粟，鬼夜哭」？真正的原因其實是……〉《雪花新聞》8月18日（<https://www.xuehua.us/a/5ebbf8f586ec4d3d4b3a7c28?lang=zh-tw>）（2021/10/22）。
- 史金波，2004。〈西夏文字是有規律的文字嗎？〉《寧夏新聞網》12月14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910200053/http://2010.nxnews.net/1168/2004-12-14/13%4062280.htm>）（2021/10/22）。
- 史金波，2013。《西夏文教程》。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托托〔元朝〕，2016，《宋史》。台北：商務印書館。
- 托托〔元朝〕，2016，《遼史》。台北：商務印書館。
- 朴景恩，2018。〈泰國文字〉收於朴景恩、鄭煥昇《你所不知道的泰國：從歷史、社會、風俗與信仰透視泰國文化的美麗與哀愁》頁135-40。台北：麥浩斯。
- 李范文，1983。〈西夏文簡介〉古今文字集成（http://www.ccamc.co/tangut_intro.php）（2021/10/22）。
- 李范文，1983。《西夏研究論集》。中國銀川：寧夏人民。
- 李燾〔南宋〕，2015。《續資治通鑑長編》。台北：商務印書館。
- 沈括〔北宋〕，2015。《夢溪筆談》。台北：商務印書館。
- 張彥遠〔唐朝〕，2015。《歷代名畫記》。台北：商務印書館。
- 廖文輝，2019。《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新北：聯經。
- 劉安〔西漢〕，2016。《淮南子》。台北：商務印書館。
- 蔣為文，2017。《越南魂：語言、文字與反霸權》。台南：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
- 鄭煥昇，2018b。〈泰語與鄰近國家的語言〉收於朴景恩、鄭煥昇《你所不知道的泰國：從歷史、社會、風俗與信仰透視泰國文化的美麗與哀愁》頁123-34。台北：麥浩斯。
- 鄭煥昇，2018a。〈泰族與泰語〉收於朴景恩、鄭煥昇《你所不知道的泰國：從歷史、社會、風俗與信仰透視泰國文化的美麗與哀愁》頁115-22。台北：麥浩斯。
- 頤和大有，2021。〈寧夏人自己的歷史——西夏文字的創造〉（<https://www.gushiciku.cn/dl/0pAwg/zh-tw>）（2021/10/22）
- 嚴智宏，2005。〈南傳佛教在東南亞的先驅：泰國墮羅鉢底時期的雕塑〉《台灣東南亞學刊》2卷1期，頁3-60。
- 嚴智宏，2020。〈泰國《蘭堪亨第一號石碑》的辨與辯〉「2020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11月23-24日。

- Chiung, Wi-Vung. 2020. *Taiwan and Vietnam: Language, Literacy and Nationalism*. Tainan: Asian A-tsiu International and 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 Diskul, M. C. Subhadradis. 1999. *Sukhothai Art*. Bangkok: Prince Maha Chakri Sirindhorn Anthropology Centre.
- Fabiani, Paolo. 2009. *The Philosophy of the Imagination in Vico and Malebranche*, trans. by Giorgio Pinton. Borgo Albizi, Firenze: Firenze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Joshua. 1999.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iswold, Alexander B. 1967. *Towards a History of Sukhodaya Art*. Bangkok: Fine Arts Department.
- Gosling, Betty. 1991. *Sukhothai: Its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D. G. E. 1994.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Heine-Geldern, Robert. 1956. *Conceptions of State and Kingship in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o, Chi Minh. 1945. *Ho Chi Minh's Speeches*. Hanoi: Thế Giới Publishers.
- Jiang, Y. J. 1971. *Ho Chi Minh ti Tiong-kok* [Ho Chi Minh in China]. Taipei: Chian-ui.
- Libkind, Karmela. 1999. "Social Psychology," in Joshua Fishman, ed.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pp. 140-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guyen, Q. H. 1999. "Han Characters, Nom Characters, and Vietnam's Historical References." *Ngon Ngu and Doi Song*, Vol. 6, No. 5, pp. 2-7.
- Stratton, Carol, and M. M. Scott. 1987. *The art of Sukhothai: Thailand's Golden Age, from the Mid-thirteenth to the Mid-fifteenth Centurie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Beek, Steve, and Luca Invernizzi Tettoni. 1999. *The Arts of Thailand*. Hong Kong: Periplus Editions.

I Made Script Therefore I Am: On the Creation of Thai Script and That of Western Xia and Vietnam

Chih-hung Yen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Puli, Nantou, TAIWAN*

Abstract

I think therefore I am. Likewise, I create script therefore I am.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 create script, I infer my existence. No matter what kind of script I create, there must be a practitioner of script, that is, “I”; therefor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 exist.” Similarly, the fact that my country has created its own script proves that my country exists. By creating a script specific to a community or a country, members of the unity can imagine that they shape and form a united community. This article takes three East Asian countries as examples to discuss their creation of scrip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ast Asian nationalism. Although the three countries we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time and space, they were all near the borders the Chinese empire and existed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print capitalism. They all tried to reconfirmed their own independence by creating or adopting a particular set of script as their official writing systems in order to establ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subjectivities when they attempted to keep away from the interference of foreign domination. In the process, script played a key role. It functioned as a social bonding agent, enabling people, who did not know each other, to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and to imagine that they were a community. Moreover, it made it clear to the members that the new country was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 ones. The creation of script gave the weaker or smaller countries that were ruled, interfered in, or bullied by powerful empires an autonomous field, a tool to justify their existence, and a way to unite their people and to work for their own cultures.

Keywords: creation of script, Sukhothai/Thailand, Western Xia, Vietnam, national identity

